

激励斗志 瓦解敌军 动员群众

解放大西南彰显我军政治工作优势威力

■孙冠楠

1949年12月27日，成都战役落下帷幕，在人民解放军的大迂回追击下，以胡宗南集团为首的70万国民党军土崩瓦解。同一天，我军发起滇南战役，彻底粉碎国民党军残敌割据西南的企图。在这场进军大西南的追击战中，我军之所以能够迅速歼灭国民党军近百万兵力，离不开指战员英勇无畏的连续作战，更离不开我军强有力政治工作的优势和威力。

激励斗志，以快打慢。进军大西南，是解放战争的收官之战，是我军克服重重险阻、连续抢关夺隘的经典之战。要想先敌抢占战略要点、断其退路，我军不仅要急行军连续追击数千里，还要征服途中的重峦叠嶂、纵横沟壑、急流恶水，没有必胜信心和顽强意志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前委和政治部充分认识到部队可能面临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指导各级抓住主要思想倾向严于解剖，要求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党（团）员模范带头，为部队作表率。各部队围绕不怕困难、不怕艰苦、不怕牺牲战斗作风，开展群众性思想政治工作。各部队党组织发出“吃大苦，耐大劳，为人民立大功”“追敌必追、追必到底、不歼不止”等号召，沿途开展赛走路、赛速度、赛团结和互助友爱活动，广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干部深入班排，边行军边动员。各级指战员在“山高没有我们脚板高，山大没有我们决心大”“英雄不怕苦，战士何畏寒”等口号鼓舞下，不畏艰险，连续追击，大胆迂回，先死后歼，把敌人变成瓮中之鳖。

从陕甘入川的北线第18兵团，翻越摩天岭、铁锁关、七盘关、剑门关等30多座关隘，战胜雪山和“蜀道”的艰难险阻，鞋子烂了就赤足走，脚打了泡就贴着走，连续行军作战7昼夜，在预定时间内进入绵阳地区，完成对胡宗南集团的合围。南线第5兵团主力和第3兵团第10军迂回湘黔北上入川，跨过“梯子岩”“百丈岩”“白云山”“南天门”等险恶地形，所经之地人烟稀少，保障困难，有的部队每天只能吃一顿饭，仍不顾饥渴劳累，一路高速猛进，歼敌于成都平原。滇南战役中的二野、四野部队在“歼灭最后残存敌



成都解放后，人民群众夹道欢迎进城解放军

人”信念鼓舞下，克服山高谷深、道路不通、疫病流行等重重困难，紧追敌人不放，每天行军60至75公里，有的部队甚至昼夜急行军90至100公里，最终抢到敌人前面。不胜不休的英雄气概、坚韧顽强的钢铁意志，是我军完成西南追歼任务的可靠保障。

攻心为上，以强慑弱。进军大西南是我军乘胜追击下的压倒性胜利，政治工作在瓦解敌军、分化敌营、迫敌投诚等方面作出历史性贡献。成都战役、滇南战役发起前，我军已解放全国大部分地区，蒋介石一直试图整合国民党军在西南地区的90多万兵力，割据西南负隅顽抗。然而，这些残存的国民党军在节节胜利、气势如虹的我军面前，早已成惊弓之鸟。党中央、中央军委准确抓住敌人杂牌多嫡系少、主力部队少、官兵愿战者少等弱点，在对敌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开展一系列强大政治攻势，收到巨大成效。

进军西南前及进军期间，我军有选择地派遣敌工人员、中共党员、进步人士、起义人员等，秘密深入敌军内部，鼓动其人员、部队起义，通过同乡、同学、同

事、亲属关系，多渠道、多层次、多角度向有关将领开展政治争取工作。我党我军不仅注重做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也做蒋介石嫡系的工作，甚至向胡宗南集团的兵团司令晓以大义、指明出路。前线部队利用敌人战略上失去主动、内部空前动摇和分化的有利时机，通过广播、报纸、传单等媒介，对被围之敌宣传我军“八项和平条件”“约法八章”等对起义、投诚人员的宽大政策，号召敌军停止抵抗、投奔光明。这些政治瓦解与军事攻势紧密结合，在陷入困境的国民党军中激起很大反响，内部迅速分化，纷纷起义投诚。据统计，国民党起义将官达200余名，起义部队番号达110个，起义人数占敌军被歼总数的60%。

团结群众，以诚取胜。进军大西南，面临山川阻隔、交通不便、远离后方等困难，争取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至关重要。为配合野战军胜利完成进军任务，中共中央专门致电当地党组织，指示他们“加强自己的活动，准备迎接解放军主力的到来”。进军西南作战开始后，中共西南各级党组织不仅积极组织游击队配

合作战，还广泛发动群众筹集物资、拥军支前，西南人民踊跃为解放军送情报、当向导、搞运输、抬担架、修桥铺路。中共滇桂黔边委所辖地区“在迎接野战军就是迎接胜利”口号指导下，成立“迎军委员会”“迎军工作团”，建立筹粮、运输、慰劳等支前小组，使我军沿途“有茶水、有粮食、有慰劳、有驻地、有驴马可用”，尽最大可能保证过境部队需要，使我军指战员保持充沛体力和旺盛斗志。

我军在进军大西南期间，不仅严格执行群众纪律，还高度重视加强部队的民族政策教育。当时的西南5省是彝、羌、苗、土家、哈尼、布依、傣、白等族主要聚居地，占全国少数民族半数以上，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少数民族同胞并不了解人民军队的性质和政策。二野前委专门下发《关于少数民族工作指示》《进入少数民族区域内的一些注意事项》等文件，要求全军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和宗教信仰。进军西南作战开始后，由于我党我军对民族工作的重视，各部队贯彻民族统战政策有力，各少数民族迅速动员起来，或提供粮、肉等物资，或踊跃参加支前工作，使我军在少数民族地区顺利完成各项任务。据60军179师535团干部姚程回忆，进驻松潘的人民解放军对少数民族群众秋毫无犯，还组织干部战士深入村寨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讲民族平等，讲民族团结，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民族矛盾给各族群众带来的灾难。正是由于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我军的美誉不胫而走，为赢得西南大解放创造了坚实群众基础。

（作者单位为95795部队教研部）



警察穿上“锁子甲”，竟因怕被咬

■张远年

为应对日益增多的各种威胁，德国警方最近几年崇尚“复古风”，开始装备“锁子甲”这种历史悠久的盔甲，为警员提供更好的保护。除了“锁子甲”，德国警察在行动中，有时还会手持棍棒、头戴帽盔抓捕人犯。“明亮盔甲”的形象，让德国媒体调侃道，看看这些条顿骑士，我们是回到了中世纪吗？

将小直径金属圆环铰接叠合或焊接在一起，形成罩衣状护甲，披挂全身，即为“锁子甲”。在西方，根据外形和中国，“锁子甲”也被称为“链甲”，在中国古代则被称为“环锁铠”。因独特制作工艺，“锁子甲”兼有类似织物的灵活性和金属的硬度，既能贴合人体肢体动作，又能抗利器穿刺、劈砍。同时，相较于铸造大面积的金属盔甲，单个金属环更容易生产，只要有充裕人力资源，“锁子甲”就可大范围装备。“锁子甲”因此成为历史上装备范围最广，装备时间最长的一种护甲形式。

关于“锁子甲”的起源，目前还存在争议。一般认为，这种古老的金属护甲发源于欧洲中部或北部。考古发现最早的“锁子甲”出现在位于罗马尼亚的、公元前4世纪的凯尔特人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用织物串在一起的金属环，被认为是穿戴用的防护装具。在丹麦的“约特斯普林木船”遗迹中也有“锁子甲”的痕迹。还有考古学家指出，大约公元前8世纪，现在的波希米亚地区就已经出现了“锁子甲”。

罗马人在公元前3世纪开始使用“锁子甲”，制作工艺据信来自于他们的北方邻居，罗马人将这种盔甲称为“Loricamata”。罗马“锁子甲”采用传承自希腊亚麻胸甲的肩部承重设计，使盔甲重量能够更好地落在士兵双肩，同时甲衣下摆一直延伸到膝盖上方，防护面积大为提高。

到中世纪，“锁子甲”依然在欧洲各种盔甲中占据重要地位，相比各种纺织物和皮革盔甲，“锁子甲”能够提供更好

的保护，比后来出现的板甲也更便宜。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西亚和东亚，也出现了“锁子甲”工艺，奥斯曼帝国的“板链甲”，波斯帝国的“四链甲”，都属于“锁子甲”的变种或升级版。

随着火器的出现，“锁子甲”同其他盔甲一样，开始淡出战场。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坦克兵会在自己的钢盔前挂下挂上一片“锁子甲”充当防护面具，在防止装甲被击穿时产生碎片伤害面部的同时，铁环之间的空隙还能保证视野。在这之后，“锁子甲”便从战场上彻底消失。

德国警方装备的“锁子甲”，虽然设计原理与以往的“锁子甲”相似，但材质方面有很大不同。根据最先发现这种“复古”装备的巴伐利亚州警方介绍，他们采用的这种现代“锁子甲”，材质接近于铝材，重量轻、强度高、透气性好，比传统的防刺服性能更好。

至于为何穿上“锁子甲”，按照德国警方的说法，是因为怕被咬。根据巴伐利亚州刑事调查局的统计，2014年有198人次的警员在行动中被犯罪分子咬伤，2015年为223人次，2016年这一数字更是达到281人次，以咬人对抗警方的案例连续几年呈大幅增长态势。

根据巴伐利亚州警方的消息，为保护警员不被咬伤，感染传染性疾病，他们为警员装备了“锁子甲”。对于咬人的犯罪分子来说，“锁子甲”除咬不动外并不会带来其他伤害，因为德国警察装备的“锁子甲”，在金属链甲表层涂有软质涂层，无味无毒，按照警方说法，“不会破坏咬入者的牙齿齿琅质”。



德国警察有时会在“锁子甲”外套上防弹衣



手持棍棒、身穿“锁子甲”的德国警察



被称为“现代战争之父”的古斯塔夫二世



毛奇在参谋机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各国军队参谋机构的发展都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漫长历史过程。在军事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参谋机构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由单一到合成、由高层机关向低层机关延伸的历史演变。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拉开世界近代史的序幕。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军队指挥日益复杂。17世纪30年代，被称为“现代战争之父”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建立类似现在参谋部的机构——军需总监部，这是现代参谋机构的雏形。

18世纪后，两次技术革命极大推动社会生产力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军队规模和组成随之发生较大变化，出现不同兵种和军、师、旅等沿用至今的编制，依靠统帅个人指挥庞大军队进行诸兵种协同作战已不现实。1801年，拿破仑任命贝蒂埃组建军事史上首个参谋处，该参谋处机构设置齐全，分工明确，为现代总参谋部确立基本框架。

在瑞典军需总监部和法军参谋处的启发下，世界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总参谋部，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应运而生。1858年9月，毛奇出任第四任总参谋长，使参谋部的职权进一步扩大，开创普鲁士军事史上第一次正式由总参谋长指挥作战行动的先例。同时，以普鲁士参谋部为标杆，世界各国军队也开始创立各具特色的参谋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武器装备、作战规模和样式进一步发展，参谋机构建设出现新的飞跃。

一是分工更加精细。奥匈帝国军队参谋部设有作战处、地理署、情报署、电讯署、交通署等部门。美国远征军参谋部设有作战处、训练处、协调处和情报处等职能机构。二是运行更加规范。美国于1903年颁布《一般参谋法案》，苏联野战司令部制定《战时军队野战指挥条例》等一系列文件，对规范总参谋部工作，提高工作效率起到积极作用。三是功能更加强大。各大国军队中开始出现不同形式的联合指挥机关。英国成立陆军、空军和海军委员会，以协调盟国或诸兵种作战，苏联在总参谋部内增设装甲兵部、空军部和海军部等机构。四是地位更加突出。1917年，美军总参谋部人数从1903年组建伊始的数十人发展到1072人，美国法律规定“参谋长应有高于陆军所有军官的军衔和地位”，苏联于1918年建立总参谋部，成为红军最高指挥机关，旧日本陆军以普鲁士模式组建参谋本部后，明确规定陆军由总参谋长统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的发展促使各国军队参谋机构也做出相应调整。美、英两国于1942年成立盟军最高参谋部——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美国同时成立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并延续至今。苏联于1941年对总参谋部进行改组，使总参谋部成为大本营最高作战指挥机构，统领苏联全部武装力量。

二战后，现代战争模式发生前所未有变化，对参谋机构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世界各国纷纷进行军队指挥体制改革，参谋机构建设开启新篇章，呈

大国军队总参谋部源起之十：漫长发展 殊途同归

■苏波 蒋国萍

现出鲜明特性。

地位重要。美国于1958年通过《国防部改组法》，明确提出加强参联会和主席权力。1986年通过《戈德华特-尼科尔森国防部改组法》，取消军种作战指挥权，国防部长通过参联会对九大联合司令部实施统一指挥。苏联军队及现在的俄军为实施对军队的集中指挥，明确规定总参谋部是国防部首要部门，在诸指挥机关中起统率作用，总参谋长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日本于1986年成立“防卫改革委员会”，扩大参联会权限，解决自卫队统一指挥问题。法国、以色列总参谋部则被明确为全军最高军事指挥机关。

机构精干。经过1986年的改组，美国形成“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各联合司令部和特种司令部”的指挥架构，有效避免冗长的讨论和议而不决，便于总统最后决断。2012年，俄海、空军中央指挥所并入总参谋部，俄军形成以总参谋部为主体的“总统-国防部长-总参谋部-军区及直属战略力量”4级指挥架构。同年，美军正式组建联合部队参谋部，“国防参谋部-联合部队参谋部-机动部队”3级作战指挥体制正式形成。以色列军队实行“总参谋部-军区-师”3级指挥体制，指挥决策更显高效。通常情况下，以军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通过军区司令部对所属陆、海、空三军实施逐级指挥。紧急情况下，总参谋长或副总参谋长可越级直接指挥到师甚至旅。

重视人才。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参谋机构的人才建设。俄军总参谋长任职前要经过推荐、挑选、考核、审查、试用等一系列过程，除具备较好的军政素质和文化素养外，还必须担任过军事指挥员，并具有较强的作战指挥能力和干练的工作作风。以色列规定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人选必须是经过严格挑选、考核和担任过军区司令的高级军官，年富力强，具有部队和司令部机关的工作经验。日本《野战参谋勤务》则明确提出参谋人员需具备良好军事素养、强烈责任心、综合判断能力等素质。在参谋培训方面，美、英、俄、德等国军队坚持以院校培训为主，结合在职培训和演习训练，不断强化参谋人员业务技能。美军规定，各级参谋人员必须经过相应级别培训，并结合每年的演习强化参谋技能训练。德国国防军则要求参谋人员需接受现代战争理论课学习、办公自动化技能培养、高级军校深造和野战部队代职锻炼等培训方式。

（作者单位为江西省军区吉安军分区）

